



CSSCI来源集刊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21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21
第 21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童英 李融
责任编辑:吴雨时
责任校对:楼晓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与文论. 21 / 曹顺庆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614—5790—0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文集
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G112.53②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9156 号

书名 中外文化与文论 (21)

主 编 曹顺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790—0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21
字 数 37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 1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我国当代文论建构浅议 钱中文

比较文学研究

- | | | |
|----|-------------------------|---------|
| 7 | 主持人语 | 曹顺庆 |
| 9 | 两岸学者宏观《文心雕龙》 | 黄维梁 徐志啸 |
| 21 | 文明异质性与比较文学变异性 | 王超 |
| 34 | 从变异学的角度看寒山诗在中美的接受差异 | 赵渭绒 |
| 46 | 经学文论在汉代的体制化进程 | 刘朝谦 |
| 58 | 浅析英语书写中刘勰的身份重建 | 刘颖 |
| 69 | “变异学”与新“世界文学”模式：比较诗学新方向 | 梁昭 |
| 78 | 再论英语世界郭沫若研究的意识形态偏见 | 杨玉英 |
| 87 | 四川“好人”对布莱希特的影响 | 邓经武 |

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基本问题研究

- | | | |
|-----|-------------------------------|---------|
| 95 | 主持人语 | 冯宪光 |
| | 符号经济与剩余价值的流转： | 刘方喜 |
| 97 | 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 | |
| 106 | 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思想的批判基质 | 庄锡华 |
| 116 | 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与普世价值 | 毛崇杰 |
| 129 | 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美学初探 | 刘旭光 |
| 146 |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建设 | 金雅 |
| 155 |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
考察与分析 | 李小贝 丁国旗 |

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研究

171	主持人语	傅其林
	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苏俄化和中国化问题之反思	
173	——来自原苏联美学家的视角	林精华
185	论詹姆逊的艺术形式观	赵利民
193	以“生活”之名：青年卢卡奇对审美主义的批判	支云杰
204	阿多诺研究在中国	谭成
217	詹姆逊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匡宇
	现代性徘徊的幽灵	柴焰
228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的电影理论	王小平
241	从阿里夫·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理论 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构	肖彦

当代中国文论建构研究

249	主持人语	赵毅衡
251	文学批评方法原创性的基点问题	邹建军
255	“理论之后”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生产的三个问题	覃莉嘉
263	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价值评估	杜雪琴
268	异变与正位：接受美学与都市化进程中的受众主体研究	李志艳
278	文学场：文学及其周边	张意
	跨媒介流传的艺术沟通与女性光芒	
288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女性主义探析	傅守祥
298	武侠小说关键词研究之三	李欧
307	中国历史古装片：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的双重观照	邱嵐
317	“古今之争”与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柳改玲

从一元到多元，从求同到求异

327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会暨“国外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 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周维东 罗飞
-----	---	--------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 我国当代文论建构浅议

钱中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同西方文化、文论思想一起，不断介绍到国内，那时我们把它定位在“西马”。这西马二字，就是说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原典意义上的文论，它不同于前苏联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论，同时也不是我们中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形态，于是在我国的主流文化思潮中，“西马非马”成了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

这个“西马非马”的说法实际上是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们不过是苏联学者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说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同时，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是说，只有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从马克思主义原典意义上发展起来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上面的这类说法，曾使我国心有余悸的学者一时不敢接近它们，即使有所接触，也是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的。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近百年来在我国不同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有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具体需要而建立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它们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总能指明社会发展的道路，拨正社会发展的航向，或是挽救革命于颓势，或是促进了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还存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派幼稚病，甚至“左”倾的、以极“左”形式出现的教条化了的东西，在一个时期内，它们都被称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可是它们在实行过程中，在社会改造中，都曾给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进程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甚至重大的灾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人们认识到，识别与检验不同形态、不同倾向而一时都被叫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那就是社会实践。正是社会实践这一唯一标准，使

人们辨别清楚了什么是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最终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典意义上的文论，就这点来说，的确是“西马非马”，因为原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作一次。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过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典出发，结合西方各国所处的具体社会的、文化文艺的实践而进行阐发和创造的理论，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由于国情不同，文化传统有别，社会问题有同有异，特别是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哲学思潮的交叉渗透和影响，因此它们形态多样，学说纷呈而显得十分驳杂。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并没有在各自的国家社会生活中获得中国式的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因此它们只能主要活动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并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提出各种文化批判的策略，展示着文化与文学艺术背后隐藏着的种种因素与本质特性，这是其一。其二，马克思主义并非只在苏联（一度占有主导地位）、中国获得传播，在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结合社会实际，同样获得了相应的发展，而且极有自己的特色，虽然它在东方和西方不同国家的传播和作用不能等量齐观。总体上说，不同国家的西马文论，是对西方的各个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文化成果与传统的继承，虽然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近百年来历史发展的曲折，但它们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组成部分，并且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主要的历史成果。我以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世界性的总体观念十分重要，这是一种宏大而开放的世界性的历史观，这种观念不至于再次使我们酿成“唯我独马、唯我独革”的封闭心态。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有亲身的体验和历史的教训。

自然，对于西马文论，我们不能把它照搬。近百年来，西马文论广泛涉及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文化与政治，探讨了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文化及其不断出现的危机、资本主义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所有权或文化霸权问题，论述了社会经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文学艺术生产的特征及艺术传播，研究了审美、审美文化、审美人类学、审美救赎、大众文化的争论、文化研究和对现代性的坚持。西马文论论述范围极广，它们批判西方政治制度、文化体制的大量著述，既有理论上的不足、失误与不彻底性，又有切近生活的问题意识和深入而独到的研究。我国社会已经进入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在文化、艺术方面正在涌现诸多新问题，它们和西方不同发展阶段发生的众多的文化问题十分相似。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本着批判与鉴别、综合与创新的方针，吸取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

的有用经验，将它看做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资源，为我所用。

几十年来，我国学者不仅译介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而且在研究方面也获得了巨大成就。从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之初，出现了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朱立元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刘秀兰的《卢卡奇新论》以及马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等一系列有学术分量的著作。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可说是长盛不衰。就专著方面来说，出现了王向峰的《〈手稿〉的美学解读》以及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中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前后期美学文论的系统论说，还有多种关于西马学者的个案研究，如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政治文化诗学研究》、李世涛的《通向一种文化政治诗学——詹姆逊文艺阐述理论与实践研究》与丁国旗的《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手头资料有限，肯定还有这方面的著作，只好暂付阙如）。至于论文，有《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其他刊物刊载的大量论文，而且就我所知，还有不少尚未出版的关于西马代表人物的专人的个案研究的博士论文。这些著作拓展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视野，扩大了我们知识的领域。

在这里，我要提及冯宪光主持的《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研究》这一项目的系列专著，这一专题系列，吸收了著名的西马文艺理论家的综合性成果，归纳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四个维度，并将目标定位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问题的研究之上。其中有邱晓林的《从立场到方法》的意识形态文艺理论研究，有温恕的《精神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艺术生产理论，有傅其林的《审美意识形态的人类学阐述》的审美人类学研究，有冯宪光的《在艺术与革命之间》的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

这一专题系列的特点是：第一，它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典精神。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本质特性的论述，始终是文学理论工作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上述四个方面确是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阐释和实践中经常提出的问题，也是最为基本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研究文学理论时经常探讨的对象，而且在我看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家对这些方面探讨得相当深入，范围宽广。我们探讨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往往只进行单个方面的研究，或是几个方面有所穿插，或是一一排列给予概述。文艺的本质是多层次的。专题系列把上述四个方面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有本质特性的方面，认为它们具有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互相渗透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了各自的本

体论思想，最后由政治学文论统摄全局，为理解文艺本质特性提供了多个切入入口，极有启发意义。

第二，专题系列把国外多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做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揭示了它们各自独立、互有交叉、同中有异、甚至互有批判的相互关系，探讨了各派理论自身的历史传承、发展和演变过程。同时，在梳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阐释与把握了近百年来各个时期不同学派理论的流变与各自的个性特征以及它们的得与失。专题系列史论结合，但不是一种理论史的写法，它以论理专题为主，使之融化于丰富的史实之中，从总体上提出了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描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幅具有全景性的清晰画面，极富探索、创新精神。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题系列研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其实也是我国文学理论建设中碰到的重要问题，因此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完全可以把其中的有用成分，通过鉴别，进行改造，纳入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之中。

第三，这一专题系列在具体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有所拓展与丰富。比如，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这个著名原则的结构中，文学艺术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即文学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同流派的研究中，虽然出发点和具体观点有所区别，但大体上已形成一种共识，国内学者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从立场到方法》一书花了那么大的篇幅，把它作为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方面，对其进行细致的梳理、分析、区别与阐释。其实，只要愿意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阅读一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那段原话，那是再明白不过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涵义本来就很复杂，具体使用时是应当进行辨析的。但是这一概念如今随便使用到这种程度，比如不同的人说“意识形态分歧”，实际上多半是指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的分歧。这种简单化了的说法，不仅掩盖了意识形态涵义的复杂性，而且使得意识形态一词更具贬义色彩，以至于文学理论界有的人一见到别的学者使用了意识形态四字，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就把它当做思想系统与政治概念，破口大骂，宣布文学无关政治，予以否定。马克思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既在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也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如他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论说中所说的意识形态就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因为这一论述，对不同的社会形态结构都是适用的。我们尽可以不同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对这段著名的论述断章取义，只念它的半句，但它已成为一种科学的指导思想。而且马克思还把感情形态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这里就不细说了。还有如《审美意识形态的

人类学阐述》一书，前人已经将文学理论的研究，转向审美人类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我在《文学发展论》一书的开头几章，实际上使用了这种方法对文学的起源作过初步探讨，但在写作它们的时候，只是从发生学观点来讨论问题，而并未从人类学角度进行考虑。后来在写作《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时，就比较自觉一些，就一个观念的发生来“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一文化人类学思想极为重要。《审美意识形态的人类学》一书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这方面的众多学说，极具启迪意义。将审美置于人类学研究的框架，置于起源、发生、发展的人类学的探讨之中，形成审美人类学以及审美文化理论，那么，不管你反对与否，它都自然会导向审美意识形态的历史生成。自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但书中论述将巴赫金列入西马，这可能是值得商榷的，可能会引起争议。其他如《精神生产与艺术生产》与《在革命与艺术之间》，都对各自问题的起源、成因、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派别之间的分歧等作了细致的辨析，具有叙述态度的客观性与论述的深刻性。西马学者就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艺术生产与经济、从意识形态生产到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论述，甚至将文学生产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由此而形成了他们各具特色的学派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学作品的审美语言、结构、意象等层面，细加探究，都是指向政治的。在此基础上，主编者对于上述四种形态所进行的整合就水到渠成：“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类学文论、意识形态文论和艺术生产文论，其最终的归宿是政治学文论。几种本体论形态的文艺理论，在政治学的归宿上整合起来了。”在政治学的指导下，生发了西马文论的多种样态，而极为复杂的西马文论的多样性，又为政治学的最终目的所制约，这是很有深度的理论见解，说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为本质的方面。这样宏放求真的理论观点，实事求是的理论概括，贯穿于专题系列。可以说，这套专题系列是近几年来我国学者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当今美学、文学理论的研究蓬勃发展，新说四起，多样化的大趋势已经形成。要倡导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出发，结合当今文化、文艺创造中不断发生的新的实际需求，拓展它们的内涵，提出新命题，阐述新命题，而有所创新。坚持和继承是为了创新，真正的理论创新，才能使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获得新的生命和蓬勃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套专题系列，对于创建我国文艺理论的新形态，吸收外国文论的长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探讨学术问题，重要的是对于现实的需求要有深刻的理解并与之相结合；

要站到学术的前沿，善于鉴别各种学术趋向。同时还要有一个坚实的、坚定的立足点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在学术探讨中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需要求真，也需要求善和求美，在独立自由、求真求善求美中进行平等的对话。差不多在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走向对话：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走向对话，总要尊重对方，总要把对方当做一个有思想的载体，即使思想有上下之分，价值有高低之别，双方也应当是平等的、独立的。也许我的思想并不比你的思想高明，但在某个方面有一得之见，反过来，你的思想对我来说也是如此。那种自以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尽在自己手里、霸气十足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风，早已过时。要进行对话，就要试试站到他者的一面，通过比较，明白得失，这就需要宽容和承认误差。宽容和承认误差不是肯定错误，而是肯定学术探索中有一个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阅读中必然存在误解与误差。例如阅读经典著作，误解就是并不理解原典意义，任意解释，再来代人立言，批判别人，这必然导致歪曲对方，无中生有，谬误百出。在阅读经典时，误差是必要的，人们总是在理解原典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一些问题给予新的解释。这就需要利用他者思想中的有用成分，用以激活自己，在鉴别和融化中，走向新的创造境界。同时，在我们的学术探讨中，还应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深切地关怀人们的生存处境及其精神成长，改善人们的精神生态环境，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使我们的研究，既是高度科学的，又是具有高度人文精神的。

作者简介：

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比较文学研究

曹顺庆

主持人语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拓展到跨语言、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以来，“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成为比较文学学者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也是海外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们试图打通中西文论话语努力的方向。

而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努力，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西”，无论是回到不同文化话语之源，厘清不同文论体系的逻辑和畛域，还是借助浪漫主义文论、现象学、阐释学、解构主义等理论资源，试图在中西两种话语体系之外，寻求双方可通约的共同论域——凡此种种，都受到不断的反思和质疑，“比较”所朝向的目标似乎更为扑朔迷离、不可接近。但这些研究和思考仍在进行下去，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鲜的成果。这是因为，“比较”的行为一旦产生，便开拓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一种在原分类体系之外的新的论域，一种“在……之间”的进行知识整合的创新。并且，“比较”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结果：被比较的双方均被改变。

这不仅是说，在当今多元存在的背景下，任何一种文论话语都不可能自说自话；这还意味着，“我者”与“他者”被居间性质的话语牵扯进一个新的表述空间之后，其各自的存在样态和品质都不可能维持原样。

本栏目论文都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比较视野”带来的理论话语和文学现象的改变。

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研究方面，台湾佛光大学的黄维梁教授和复旦大学的徐志啸教授就中西诗学长期关注的重点——《文心雕龙》——进行的再讨论，体现在《两岸学者宏观〈文心雕龙〉》一文

中。其中透露了黄维梁教授撰写的以《文心雕龙》的“六观说”来分析中外文学作品的一系列论文，这正是对传统文论话语进行现代性改造的尝试，值得关注。四川大学刘颖副教授的《浅析英语书写中刘勰的身份重建》一文，提供了刘勰研究的异域视角。本期还刊登了四川师范大学刘朝谦教授的论文《经学文论在汉代的体制化进程》。此文清晰地阐述了经学国家化进程对汉代“文”、“文学”概念变迁的影响。

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方面，本期有三篇以“变异学”为主题的论文，都是对我于2005年提出的“变异研究”的深化。它们是：四川音乐学院的王超研究员的《文明异质性与比较文学变异性》，四川大学赵渭绒博士的《从变异学的角度看寒山诗在中美的接受差异》和四川大学梁昭博士的《“变异学”与新“世界文学”模式：比较诗学新方向》。

在文学作品研究方面，成都大学邓经武教授的《四川“好人”对布莱希特的影响》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揭示了德国戏剧家建构“四川”意象的背景和原因。乐山师范学院杨玉英副教授的《再论英语世界郭沫若研究的意识形态偏见》，批判性地总结了英语世界的学者对中国当代诗人郭沫若研究的得失。

这一组以个案研究为主的论文虽然没有建构大的理论视野，但都处于当下比较文学学界反思和推进“比较研究”的脉络中，都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不乏新意的观点。从中可见，在具有“差异性”的文化之间穿越，讨论诸种“变异性”，乃是全球化交流和“比较研究”带给我们的新的思考契机。

两岸学者宏观《文心雕龙》

黄维梁 徐志啸

[摘要] 本文是台湾学者黄维梁先生与大陆学者徐志啸先生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一篇谈话。内容涉及《文心雕龙》的体例研究、与西方文论的比较研究以及如何利用《文心雕龙》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外文学作品进行批评等重要内容。两位学者在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最终使《文心雕龙》走向世界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关键词] 文心雕龙 体例研究 西方文论话语 中国文论话语

一、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

徐志啸 问世于中国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文心雕龙》，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部堪称空前绝后的文论大书，赞誉它具有“体大思精”的风格特色应该说完全恰如其分。它上下二部各二十五篇（共五十篇）的框架体制，系统而又全面地概括、剖析、阐释了古代文学的枢纽特征、渊源流变，各类文体的风格特点，不同形式文学作品的创作旨要与艺术表现，并从多种角度对南朝之前（包括南朝前期）的作家作品作了评论。全书涵盖了总论（“文之枢纽”五篇）、文体论（“论文序笔”二十篇）、创作论（“剖情析采”二十篇）、文学评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及总序（《序志》一篇），它们极为严密地构建了属于刘勰本人独创的“体大思精”的文论体系，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树起了一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宏伟巨大的里程碑。

黄维梁 确实，我们今天重新来读这部问世于约一千五百年前的文论著作，依然感到它是那么宏大精致，那么深邃严密，那么令人叹为观止。它既是一部讲文章理论的著作（包括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文章），讲如何写文章、如何才能写好文章，更是一部广泛论述文

学各个方面的理论性杰作，一部令后世百代“高山仰止”的煌煌大著。

徐志啸 我在读《文心雕龙》时，特别对刘勰有意将《辨骚》篇划归入“文之枢纽”感兴趣。按理，《辨骚》即辨析骚体，或谓辨析楚辞，它应该在“文体论”的范畴，属于“论文叙笔”类，但刘勰不然，却将其列入了“总论”（“文之枢纽”）部分。我体会，他这样做，是有其特殊用意的：他写《辨骚》，实际的目的恐怕并非专为“辨”骚，而是为论“变乎骚”，“变”是核心，即总结与吸取从《诗经》至楚辞间文学变化的经验，从而阐明文学创作与文学发展的原理，这与《原道》——要依据道、《征圣》——要以圣人为师、《宗经》——要学习经典的写作方法、《正纬》——要酌纬以寓言一样，都是围绕论“文”中心而阐发作文要义的一个方面，当然，其本身也体现了刘勰对楚辞的看重、对楚辞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充分认识。

黄维梁 你说得没错。刘勰《文心雕龙》全书的布局和框架设置，都是经过他本人周密精心思考的，《序志》篇中所交代的，就是最好的体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於时序，褒贬於才略，怊怅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道、圣、经、纬作为“文之枢纽”，首当其冲，固然是时代的要求，也与刘勰本人的认识密不可分，因为在刘勰看来，写文章，“文以载道”是第一位的，圣人和经典是不可不推崇的。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我们看《辨骚》篇，其实它还有着一定的现代意义。这话怎么说？很清楚，《辨骚》中有着发展的史观，从《诗经》到楚辞，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也即如何“变”的，这是刘勰所要探讨的，他要让读者了解这当中变化的原因，为此他总结出的原理是：“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轡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读到这样的文句，读者自然也就明白，原来“变乎骚”的根本道理就在这儿——要兼容正统和奇变，要“取镕经意”才能“自铸伟辞”，要用发展的史观看待文学的演变。

徐志啸 刘勰以前，对赋究竟是什么，从何起源，争论颇多。刘勰在列举前人论述基础上，指出赋是《诗》六义之一，“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作为文体的赋，则“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其始端为荀况的《礼》、《智》、宋玉的《风》、《钓》，而赋家枚乘、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则均为楚辞所“衣被”。刘勰对赋所作的这一定义，可以说准确地抓住了赋的实质，对赋体起源的阐述，“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符合赋产生发

展的实际，可谓不移之论。他在《诠赋》篇中，按作品的不同特点，将赋分为大、小赋两类，这一大、小赋分类，以后成了文学史上赋的分类名词。刘勰既重视赋的文辞标准，要求“写物图貌，蔚似雕画”，也坚持“体物写志”、“情以物兴”、“风归丽则，辞剪美裨”，坚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与完美。他特别指出了诗人作赋是“为情而造文”，辞人作赋是“为文而造情”，这是扬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在刘勰看来，诗人作赋，是“志思蓄愤”、“吟咏情性”，是“为情而造文”，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而辞人作赋，“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乃“为文而造情”，故其文“淫丽而烦滥”。这里，刘勰实际上是提出了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问题——“为情而造文”，才符合创作的客观规律，反之，颠倒了创作顺序，难以产生富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我们仅从刘勰论赋的内容，即可看到，他的“论文叙笔”类篇章对各种文体的论述，体现了多么精辟的论断和精密的思考，而涉及赋的论述文字，并不局限于《诠赋》一篇，在其他“文体论”和“创作论”的篇章中也都有所论及。

黄维梁 没错，论赋如此，论其他文体也如此。我觉得刘勰不仅对文学类的各种文体——诗、乐府、赋、史传、诸子、论说（迄止齐梁时代）作了诠释论述，还对非文学类的文体也一一予以阐述了。我特别看重《文心雕龙》的《时序》篇，我认为，这篇《时序》篇堪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产生时间最早的一篇专门的文学史论著，它除了篇幅较短以外，其他属于文学史的诸要素都具备了，尤其是著名的“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论断，绝对是抓准了文学演变的要害，是文学与时代、历史关系实质性的精辟概括。文学虽说属于文人个人的创作，它描写的是文人眼中的客观世界，抒发的是文人个人的情感，但这个客观世界和个人情感绝对脱离不了社会历史背景条件。就刘勰当时的中国来说（其实也包含了其前和其后的中国），这背景条件就是政治教化、学术风气、君主提倡、前代文学作品的影响和继承、时代风气的影响、天才人物的杰出成就等等。文学史界一般认为中国以前没有文学史，文学史是外来概念，中国的文学史著作是受西方外来影响的结果，中国最早的文学史是近代黄人和林传甲的两部文学史。我认为，这话不全对。《文心雕龙》的《时序》篇，乃是产生时代最早且又完全符合文学史要素的内容精练、论断精辟、篇幅短小的文学史论著，它堪称世界上最早的文学史。

徐志墉 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刘勰在篇中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可以说抓住了历代文学演变的核心，既说明了文学在历代是如何演变的，也道出了这种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结合每个历史朝代本身的具体社会条件。这当中精辟的论点很多，比如“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振于下”、“玮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

等，都是十分精彩的对文学与时代变化及社会关系的认识判断。而且，篇中对历代文学特色的概括也非常到位，如西汉文学“灵均余影，于是乎在”，东汉文学“华实相附，斟酌经辞”，建安文学“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正始文学“篇体轻淡”，西晋文学“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等等。可以说，《时序》确是一篇名副其实的中国上古至南朝齐梁时代之前的简明文学史。从广义的文学史角度而言，“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这两句话，完全可以适用于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发展史，当然更可适用于二十一世纪今天人们对当代文学发展的认识。我个人认为，确定《文心雕龙·时序》篇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文学史的结论，黄先生你是首创者，可以申请国际“专利”（笑）。

二、《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

黄维梁 真要请徐教授助我申请“专利”（笑）。如果我们将这部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放在世界文论发展史上看，或者说，将它与西方著名的文学理论作对照比较，我认为，它也毫不逊色。西方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有一部《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的著作，该书中作者将宇宙社会（world）、读者（reader）、作者（writer）、作品（work）四者的关系，设计了一张关系图，图中画出了这四者之间可以互相联系的箭头，表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得出了所谓的模拟论、实用论、表现论、客体论。我以为，这个关系图，或者进而说这四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相关篇章完全可以一一予以对应说明。

徐志啸 你这一说，让我想到了美国著名华裔学者刘若愚，他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代表作《中国的文学理论》，用英语写成（中国有这部书的多种中译本），是专门给美国大学的学生（包括研究生）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阅读的，当然也适宜于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西方读者阅读。书中他在艾布拉姆斯四者关系图的基础上，增添了互逆的箭头，在四论的基础上又加了两论，成为了六论，提法上与艾布拉姆斯有所不一：玄学论（也译“形而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实用论。不过，以此对照《文心雕龙》，我还是认为，《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对宇宙社会、读者、作者、作品四者关系的论述，似乎比他讲得更具体，更清晰，只是用语不是今天所谓的“现代话语”，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西方流行的那些理论术语，这是往往被不了解情况的西方学者诟病中国没有文学理论或缺乏理论思维的理由。

黄维梁 你说得对。如果将《文心雕龙》与西方权威的亚里士多德的